

六四屠殺事件真相研究

吳仁華

台灣民主基金會訪問學者
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摘要

本文以目錄學與考據學的知識與技能為基礎，動用 40 個關鍵字，在網路上搜尋六四屠殺的相關資料。經過仔細、耐心地比對與考證，勾勒出「八九天安門事件」時期，北京高層實施戒嚴的決策經過；部隊的調動、部署以及鎮壓的情形；還有屠殺發生的地點、死傷情形，並推論當時部隊開槍的命令確實來自高層。文末，作者亦駁斥了中共當局宣稱 1989 年時，北京出現「反革命暴亂」的說法。

關鍵字

八九天安門事件、六四屠殺、北京戒嚴

壹、引言

六四屠殺事件真相研究，首先面臨的困難是資料極其欠缺。中共當局將 1949 年建政後所發生的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反右派運動、文化大革命、八九天安門事件，均列為言論和研究的禁區，而六四屠殺是其中最大的禁區，違規者會遭到嚴厲處置，因此導致六四屠殺的知情者和見證者大都不敢發聲。

中共官方和海外民間，出版了一些有關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書籍。中共官方較有代表性的是，國家教育委員會思想政治工作司編輯的《驚心動魄的 56 天》、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編輯的《戒嚴一日》；民間較有代表性的是，明

鏡出版社的《中國六四真相》。但是，中共官方的書籍完全迴避六四屠殺，民間的書籍對六四屠殺有所記錄，但很不完整，也存在許多錯誤。

相較於其它人文科學的研究項目，六四屠殺研究的資料搜集具有特殊性，主要依賴於網絡上的搜集。在網絡上搜集資料，比到圖書館、資料室搜集現成的資料，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也要艱難得多。首先要確定搜索的關鍵詞，然後使用這些關鍵詞，一一予以搜尋。網絡搜索能否做到巨細無遺，取決於搜索的關鍵詞的設定。通常人們只會使用「六四」、「六四屠殺」、「戒嚴部隊」等作為搜索的關鍵詞，這樣肯定會遺漏許多六四屠殺資料，因為很多人在網絡上不會使用這些敏感詞。如何設定搜索的關鍵詞，其實也需要目錄學的知識和技能。我設定的搜索關鍵詞不少於 40 個，結果搜集到許多六四屠殺的資料，涉及北京的八十多家醫院、一百多個地點。網絡搜索也需要毅力，比如經常通宵達旦地追蹤退役軍人的聊天，一一記錄他們在聊天時提到的官兵姓名和職務、部隊番號、部隊駐地、部隊開進時間、部隊開進時途經的地點。

在網絡搜索到的六四資料，絕大部分不是完整的紀錄，而是片斷的、殘缺的，有的甚至只是隻言片語，因為只是經歷者和知情者在網絡聊天時偶爾提到，或者是在網文中順帶提及。對於研究者而言，片斷的、殘缺的資料也是有價值的。比如，有退役軍人在網絡聊天時提到一句話：「1989 年北京戒嚴時我在北京新六所執勤」。我查證發現，「新六所」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等領導人的寓所，從而得知在北京戒嚴期間，有戒嚴部隊進駐中共領導人的寓所加強安全保衛。又比如，我憑借考據學的技能 and 知識，利用網絡搜索得到的許多時間、地點，最終破解了各戒嚴部隊在 1989 年 6 月 3 日的進軍路線，並從進軍路線沿途民眾的傷亡情況，確定各戒嚴部隊執行鎮壓命令的情況。

貳、北京戒嚴的決策情況

北京戒嚴的決定，名義上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所做出，然後由國務院頒布戒嚴令，再由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部署實施。實際上，中共政治局常委是被中共元老所操縱的木偶，拍板決定者是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以下幾次中共高層會議和中共元老密會，可見其端倪。

1989年5月16日晚上，中共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五名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全體出席；另外，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以及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列席。緊急會議做出的兩項決定之一是：鑒於目前局勢非常緊急，於5月17日向鄧小平同志進行全面的情況匯報，聽取鄧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見。

1989年5月17日上午，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齊聚鄧小平家中，名義上是召開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實際上是向鄧小平匯報請示，聽候鄧小平的指令。在場的還有楊尚昆、薄一波。會議先由趙紫陽介紹學生運動情況，但鄧小平很快就給會議定了調：「今天只談論究竟應該（對學生運動）退讓不退讓。」薄一波迫不及待地發言：「現在，後退是沒有出路的，我們已到了無路可退的地步。」楊尚昆隨即也表態：「這是水壩最後的一個大堤，不能退，一退就垮了。」鄧小平一定調，趙紫陽即便有不同看法，也不便或不敢表達了。就連反對鎮壓學生運動的胡啟立，當時也不得不違心地表示：「退是不能再退了。」緊接著，鄧小平提出調動軍隊進京，對北京實施戒嚴的意見：「我今天鄭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來，希望你們考慮。」鄧小平作為中共的「慈禧太后」，他的意見具有絕對的權威，誰也不敢反對、也無法反對。於是，會議做出四項決定，其中包括：（一）當天晚上繼續召開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具體部署如何在北京實施戒嚴；（二）5月18日上午，中共政治局常委向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報告部署北京戒嚴的情況。

1989年5月17日晚上，中共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繼續開會，楊尚昆、薄一波列席。五名常委對北京戒嚴無法達成一致意見，薄一波提議進行表決，表決結果是：李鵬、姚依林支持，趙紫陽、胡啟立反對，喬石棄權。表決一結束，趙紫陽就提出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理由是個人對北京戒嚴持有不同看法，無法繼續履行職責。楊尚昆覺得，此時趙紫陽辭職對局勢震動太大，極力勸說趙紫陽不要辭職、也不能辭職；趙紫陽收回辭職的請求，改為請病假三天。會議做出的兩項決定之一是：北京戒嚴的部署，因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嚴重分歧而陷於僵局，中共政治局全體常委於第二天上午再去鄧小平家，將問題上交給鄧小平；由鄧小平與中共元老、中央軍委

有關負責人一起決定。

1989年5月18日上午，中共元老陳雲（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時任全國政協主席）、彭真（曾任全國人大委員長）、鄧穎超（曾任全國政協主席）、楊尚昆、薄一波、王震（時任國家副主席），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中央軍委委員洪學智（時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劉華清（時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秦基偉（時任國防部部長）等人，在鄧小平家中開會，做出了五項決定：（一）於1989年5月21日零點起，在北京實施戒嚴。（二）於1989年5月19日晚上，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三）由楊尚昆負責，立即部署軍隊在北京實施戒嚴的行動計劃、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四）對徐向前元帥、聶榮臻元帥通報北京當前的形勢，以及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即將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決定。（五）鑒於目前北京乃至全國的緊張局勢，立即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發出通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委常委會要在中央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後，對北京戒嚴決定明確表態。請病假的趙紫陽未出席這次會議，此後再也沒有參與任何決策過程。

其實，鄧小平早已有調動軍隊進京鎮壓的打算。1989年5月11日下午，鄧小平邀請楊尚昆到家中匯報情況，鄧小平詢問部隊的思想狀況，楊尚昆回答說：「學潮發生以來，解放軍總政治部已連續發出4個通知，要求各大軍區認真做好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決不介入地方政府處理學潮的事務。對於涉及嚴重影響地方社會安定的打砸搶事件，地方政府需要軍隊出面維持秩序的，必須報經中央軍委批准。現在，軍隊的政治學習抓得很緊。」1989年5月13日上午，楊尚昆、趙紫陽到鄧小平家中，匯報近期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工作部署。鄧小平表態說：「這次學潮已拖得太久了，將近一個月了。老同志們心都焦急著呢。陳雲、彭真、先念、王震還有鄧大姐（鄧穎超），包括我，心裡焦急著呢。要有決斷力。」楊尚昆明白鄧小平的心思，特別就解放軍部隊的情況予以說明：「部隊官兵的思想是統一的，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這次學潮對部隊官兵的思想不會有大的影響。」最後，鄧小平特別叮嚀：「在重大政治問題面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斷，要堅持原則。當然，對這次學

潮，我們要盡力採和平的手段解決。」

鄧小平在上述兩次的談話中都很關注解放軍部隊的動態，都提到「我們要盡量採和平的手段解決這次學潮」，透露出他一直有著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想法。鄧小平本來希望通過中共政治局常委做出北京戒嚴的決議，可以名正言順地調動軍隊進京，以避免「垂簾聽政」之嫌疑，沒想到趙紫陽堅決抵制，打亂了他的如意算盤。這正是鄧小平痛恨趙紫陽，導致趙紫陽被軟禁到死的主要原因。

參、六四鎮壓的部署與實施

1989年5月18日下午，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針對北京戒嚴進行兵力部署。中央軍委的組成人員除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之外，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楊白冰（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遲浩田（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趙南起（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全都與會。會議決定：（一）北京實施戒嚴的主要任務由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承擔，其他軍區予以配合；（二）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劉華清任總指揮，遲浩田、周衣冰任副總指揮，直接對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楊尚昆在會議結束後，即帶領劉華清、遲浩田趕赴鄧小平家中，詳細匯報會議情況。鄧小平過目審議了中央軍委關於戒嚴部隊兵力部署的報告以後，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簽署了中央軍委調兵命令。

離開鄧家，楊尚昆趕回中央軍委辦公廳落實調兵命令，指示解放軍總參謀長遲浩田立即與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的司令員磋商，確定進京部隊名單、進軍時間、到達目的地時間、戒嚴主要事項等實施細則；指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立即以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名義向各大軍區發布政治動員令，要求隨時做好準備，絕對服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行動和指揮；指示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趙南起，調集好戒嚴必須的一切軍用戰備物資，並與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磋商，盡可能地解決好戒嚴部隊的食宿給養問題。當晚，解放軍總參謀部就將中央軍委的調兵命令，緊急下達到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也就是說，在1989年5月20日凌晨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之前，解放軍部隊已經動起來。

1989年5月19日晚上，戒嚴部隊指揮部向中央軍委和鄧小平、楊尚昆提交了一份報告，其中提到：

「接到赴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命令後，北京軍區、瀋陽軍區和濟南軍區的有關集團軍迅速收攏部隊，進行政治思想動員。在向北京開進中，各部隊採取佯動迂迴、隱蔽前進、多路進發、高速開進等多種辦法向北京集結。到今晚10點，先遣部隊第27集團軍、第38集團軍、第39集團軍、第63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已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準時開到北京城區，基本到達預定目的地，為進行戒嚴做好準備。其中一些部隊遭遇不明真相的學生和群眾圍堵，被圍於街頭、郊外。戒嚴部隊指揮部將堅決執行中央軍委的命令，按由遠而近、由外向裡、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則，將被圍部隊逐步調整到有利位置。」

1989年5月20日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與會的有中央軍委成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楊白冰、遲浩田、趙南起，以及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成員，聽取關於北京戒嚴實施情況的匯報。當晚，楊尚昆通過電話向鄧小平匯報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情況。

1989年5月24日上午，中央軍委再次召開擴大會議，與會者有：劉華清、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解放軍總參謀部、解放軍總政治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負責人；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國防大學的政治委員、司令員、政治部主任。洪學智主持會議，楊尚昆發表「重要講話」。該會議根據鄧小平的授意召開，主要目的是通報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問題，藉此統一解放軍高級將領的認識，以防解放軍高層產生思想分歧。

為了北京戒嚴，軍隊調動和投入的規模，遠超過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也超過1979年的中越戰爭，堪與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媲美。就軍隊調動和投入的規模而言，這幾乎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鄧小平、楊尚昆確實也是按照戰爭時期的方式來行事的。例如：各戒嚴部隊都按照戰爭時期的規定，捨棄

原來的部隊代號、啟用臨時部隊代號。臨時部隊代號的啟用，導致在開進中失散的官兵無法找到自己的部隊，因為就連負責通信聯絡的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臺、北京衛戍區通信臺的接線員，一時之間都無法弄清楚臨時部隊代號與原來部隊代號的對應關係。又例如：北京軍區、濟南軍區、瀋陽軍區、南京軍區奉命組成戒嚴指揮組，隨同部隊進京，實施戰爭時期的「靠前指揮」。「北京軍區」戒嚴指揮組，由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軍區副政委陳培民、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等人組成；「濟南軍區」戒嚴指揮組，由軍區副司令員固輝等人組成；「瀋陽軍區」戒嚴指揮組，由軍區副司令員朱敦法等人組成；「南京軍區」戒嚴指揮組，由軍區副司令員郭濤、軍區副政委史玉孝等人組成。

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會同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的通信部門，負責戒嚴部隊的通信聯絡。解放軍總參謀部「陸軍航空兵部」，負責戒嚴部隊的運輸交通，在北京市區地面交通受阻的情況下，動用直升機為戒嚴部隊運送軍用裝備物資，解決緊急交通問題；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左印生等戒嚴部隊的高級軍官，到上級機關接受任務，來回都是乘坐直升機。解放軍總參謀部「測繪總局」，緊急為戒嚴部隊繪制北京市區軍事地圖。

肆、北京戒嚴部隊的情況

中國官方至今未公布北京戒嚴部隊的資料。在 2009 年 5 月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出版前，外界一直不知道北京戒嚴部隊的詳細情況。

六四事件後，中共當局曾一度大力表彰戒嚴部隊的英雄模範單位和個人，相關的宣傳資料雖經嚴格審查，還是透露了戒嚴部隊一些信息，其中《戒嚴一日》一書透露的信息最多。該書 180 篇署名文章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戒嚴部隊的軍人，上至集團軍軍長，下至普通士兵。

根據中國的《保密條例》規定，在公開的資料中不能提到部隊番號，只能使用部隊代號，例如：第 38 集團軍就是部隊番號，公開的資料中只能使用第 38 集團軍的部隊代號「51034 部隊」。由於六四屠殺的敏感性，在中共官方有關戒嚴部隊的宣傳資料中，不僅隱去了部隊番號，就連部隊代號也一併隱去，只使用「某集團軍」、「某師」、「某團」。

筆者花費很多時間，破解了中共官方宣傳資料中所提到的所有戒嚴部隊的番號，從而確定了戒嚴部隊包括：「北京軍區」的第 24 集團軍、第 27 集團軍、第 28 集團軍、第 38 集團軍、第 63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瀋陽軍區」的第 39 集團軍、第 40 集團軍、第 64 集團軍；「濟南軍區」的第 20 集團軍、第 26 集團軍、第 54 集團軍、第 67 集團軍；「南京軍區」的第 12 集團軍；「直屬中央軍委指揮」的空降兵第 15 軍；「北京軍區」的炮兵第 14 師；「北京衛戍區」的警衛第 1 師、警衛第 3 師；「天津警備區」的坦克第 1 師、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

按理說，確定了所有戒嚴部隊的番號後，只要按照這些部隊的編制，即可計算出戒嚴部隊的總人數。但問題在於，這些部隊都不是全員進京。詳言之，「第 38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112 師、步兵第 113 師、坦克第 6 師、炮兵旅、工兵團、通信團，總共 15,099 名官兵。「空降兵第 15 軍」進京部隊有：空降兵第 43 旅、空降兵第 44 旅，以及通信營等保障部隊。「第 27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79 師、步兵第 80 師、高炮旅、工兵團、通信團、偵察營。「第 63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187 師、步兵第 188 師、坦克旅、炮兵旅、工兵團、通信團。「第 40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118 師、炮兵旅。「第 54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162 師、步兵第 127 師。「第 39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115 師、步兵第 116 師。「第 65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193 師、步兵第 194 師、守備第 3 師、高炮旅、坦克旅、通信團，共 1 萬多名官兵。「第 24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70 師、步兵第 72 師、守備第 7 旅、通信團、工兵團。

另外，「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進京部隊有：坦克第 1 團、坦克第 2 團、坦克第 3 團、裝甲步兵團、偵察營、通信營、工兵營、修理營，全師近 300 輛坦克悉數出動。「炮兵第 14 師」進京部隊有：炮兵第 6 團、炮兵第 9 團、炮兵第 10 團、炮兵第 37 團、炮兵第 208 團，總共 2,000 名官兵。「第 28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82 師、步兵第 83 師，以及部分保障部隊。「第 12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36 師、步兵第 34 師的步兵第 101 團、炮兵旅、高炮旅、坦克第 2 師的偵察營，以及部分保障部隊，總共近萬名官兵。

「第 20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58 師、步兵第 128 師。「第 26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138 師，以及部分保障部隊。「第 64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190 師，以及部分保障部隊。「第 67 集團軍」進京部隊有：步兵第 199 師，以及部分保障部隊。

戒嚴部隊採用空運、火車軍用專列輸送、摩托化開進這三種方式進京。「空運方式」進京的部隊有：空降兵第 15 軍、第 26 集團軍、第 12 集團軍。「火車軍用專列方式」進京的有：炮兵第 14 師、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5 師、第 40 集團軍、第 64 集團軍。「摩托化開進方式」進京的部隊有：北京軍區的 6 個集團軍；濟南軍區的第 20 集團軍、第 54 集團軍、第 67 集團軍；瀋陽軍區的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6 師。

「南京軍區第 12 集團軍」的情況比較特殊，是戒嚴部隊中唯一沒有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部隊。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 5 時 30 分許，戒嚴部隊占領了天安門廣場，但尚未控制天安門廣場以外的區域。天安門廣場以外，還集聚了成千上萬的抗議者；數以萬計的戒嚴部隊官兵，擁擠在天安門廣場區域，情況混亂。楊尚昆說了一句話：「如果有一個班的官兵發生騷亂，就會引起連鎖反應，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決定將第 12 集團軍於 6 月 4 日緊急空運進京。第 12 集團軍在國共內戰時期隸屬於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鄧小平時任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政委；第 12 集團軍駐紮在南苑機場，實際上是擔任「督戰隊」，如果哪支戒嚴部隊出了狀況，就要立即出動平息。

鄧小平動用如此龐大的兵力，進行如此周密的部署，不僅僅是為了對付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如果僅僅是對付學生和民眾，動用北京衛戍區的兩個警衛師和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就足矣。鄧小平當時的憂慮是「內部的政變」和「軍隊的兵變」。在他看來，有可能發動政變的人物當然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以及趙紫陽的支持者中共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中共政治局委員 /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全國人大委員長萬裏、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彭沖等人。相比之下，兵變比政變更可怕，更難預料和控制。劉亞洲當年在擔任武漢軍區空軍政委時，曾在內部報告中總結經驗教訓說：北京軍區的部隊不可靠，因為長期駐防

京畿地帶、消息靈通，了解北京的學生運動情況，普遍同情學生，執行戒嚴令當然不力。幸虧鄧小平英明，除了調動北京軍區的部隊之外，還調動了大量其他軍區的部隊進京，要不非出大問題不可。

大量資料證明，鄧小平、楊尚昆確實對解放軍戒嚴部隊做了精心的調度安排，從中可以發現劉亞洲所說的鄧小平的「英明」之處，即調動多個軍區的部隊進京，相互監督制衡、彼此難以串聯，避免發生兵變事件。例如：1989年6月3日，在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挺進時，安排了解放軍中四個最尖銳的、不屬於同一個軍區的主力軍——第38集團軍、第39集團軍、第54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擔任主攻任務；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部隊，也都是各為兩個以上的集團軍；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時候，也是同時使用了第38集團軍、第54集團軍、空降兵第15軍等多支部隊。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中，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雖然扮演主要角色，但也不被充分信任。在他們抵達天安門廣場之前，事先已在天安門廣場北側的勞動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園、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和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安排了多個集團軍，早已對天安門廣場形成了嚴密的包圍圈。在這個包圍圈的周邊，還部署了空軍部隊和炮兵部隊；空軍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北京戒嚴行動，但也奉命進入戰備狀態。第38集團軍向天安門廣場進軍時，不僅前面已預設了一個包圍圈，連後路都已被封死，第63集團軍的一個師緊隨其後，實際上起著「督戰隊」的作用。

如此周密的部署，使得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更像是鄧小平對解放軍部隊忠誠度的測試。如果第38集團軍陣前倒戈，與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勝利會師」，將立即會在預設的包圍圈內，遭到其他部隊的圍剿；同樣的，任何一支戒嚴部隊如果發動兵變，也將遭到其他部隊的圍剿。除非有足夠的部隊事先達成共識、同時行動，但這對於遭到嚴密控制的「黨軍」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何況當時集聚北京的逾二十萬部隊，來自於不同的軍區。

伍、關於清場命令和開槍命令

1989年6月1日，戒嚴部隊指揮部向中共政治局、中央軍委提供了一份報告，表示戒嚴部隊全體官兵已做好從精神到物質的全面準備，只待中央軍委一聲令下，即可開赴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這份報告，給鄧小平等人下達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提供了依據。

1989年6月2日上午，鄧小平召集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以及中共政治局留任的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開會。楊尚昆首先介紹戒嚴部隊情況，並表示對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充滿信心。緊接著，與會者紛紛發言表態，一致要求盡快讓戒嚴部隊採取行動，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最後，鄧小平下了結論：「我同意大家的意見。建議戒嚴部隊指揮部今晚開始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計劃，兩天完成。」

1989年6月2日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組成人員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會議」，傳達鄧小平拍板的清場決定，命令一部分尚在北京郊區集結待命的戒嚴部隊，於1989年6月3日零點進入北京市區，繼續向戒嚴警戒目標開進。戒嚴部隊指揮部隨即將清場命令下達到各戒嚴部隊，正式啟動了天安門廣場清場的軍事行動。第39集團軍軍長傅秉耀在署名文章〈走進血與火〉中透露，清場命令於1989年6月2日下達到軍一級指揮官，命令的保密等級定為「絕密」，屬於最高等級，規定只能傳達到師一級指揮官（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徵文辦公室，1989：上冊）。

1989年6月3日下午，楊尚昆和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召集秦基偉、李錫銘、洪學智、劉華清、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羅幹（國務院秘書長）、周衣冰、劉振華等人開會，做出五項決定：（一）從6月3日晚上9點鐘起，戒嚴部隊開始平息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北京市公安幹警予以配合。（二）戒嚴部隊於6月4日凌晨1點鐘抵達天安門廣場，清晨6點鐘完成清場任務。（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四）戒嚴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特別是北京電視臺、北京人民廣播電臺要向全北京市人民作不間

斷廣播，發布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定性為「平息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顯然是為戒嚴部隊開槍鎮壓製造依據。

1989年6月3日晚上8點30分許，根據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命令，軍用直升機開始在東、西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上空進行空中偵察，為戒嚴部隊武力挺進天安門廣場，做好最後準備。

「戒嚴部隊清場指揮部」設置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由周衣冰、劉振華等人坐鎮指揮；喬石、李錫銘、陳希同、羅幹等人也在清場指揮部。楊尚昆、李鵬、劉華清等人，在中南海遙控指揮清場行動；此時的中南海早已重兵雲集，除了原有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和北京衛戍區警衛第1師部隊，還增加了警衛第3師，以及陸軍第65集團軍的部分部隊。

在六四屠殺事件中，「開槍命令」是一個非常重要和關鍵的問題。中共當局始終迴避這個問題，包括鄧小平、楊尚昆、李鵬，也都不敢承擔下令開槍的責任，多年來其子女頻頻藉機為父輩開脫責任。

1989年6月30日，陳希同受國務院委託，在第7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8次會議上作專題報告《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其中提到：「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對空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戒嚴部隊既然是「奉命」開槍，那就是說確實有過開槍命令。

在《戒嚴一日》一書中，有十多篇戒嚴部隊官兵的署名文章，證明了的確是有過開槍命令，戒嚴部隊軍人是在接到開槍命令後才奉命開槍的。在接到開槍命令之前，各戒嚴部隊在開進過程中雖然遇到了民眾的阻攔，但都沒有開槍。一些部隊的指揮官在出發之際，還再三強調不許開槍。

北京軍區聯勤部助理員傅水生中校，在署名文章〈難忘的8天8夜〉中寫道：「（1989年6月4日凌晨）1時許，某旅兩名軍官渾身是血、滿臉是傷，跑到（清場）指揮部向首長報告部隊到達指定位置。首長詢問部隊情況，他們說

徒步上來，受傷嚴重，所帶乾糧被燒被搶。『為什麼不鳴槍？』『只接到不准開槍的命令。』」（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徵文辦公室，1989：下冊）。

第 40 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在署名文章〈再度京華〉中寫道：「（1989 年）6 月 3 日 23 時 10 分，有個穿便衣的人說什麼也要見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我見了他，他掏出工作證，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來傳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他剛傳達完，軍區前指也來指示，通報了萬壽路戒嚴部隊鳴槍示警驅散人群，迅速開進的情況。」吳家民在接到開槍命令後下令炮兵旅組成防暴隊，「鳴槍示警」接應各受阻部隊（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徵文辦公室，1989：下冊）。

第 64 集團軍副軍長劉書明和軍副政委張傳苗，在共同署名的文章〈走向德勝門〉中寫道：「上級指示：可以對空鳴槍。我們立即下令：對空鳴槍，驅散人群，分別突進。」（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徵文辦公室，1989：下冊）。

戒嚴部隊軍人的署名文章很少提到開槍，即使提到開槍，也都是「對空鳴槍」。只有解放軍畫報社攝影記者李靖，在署名文章〈鏡頭下的長安街〉中提到「戰士開槍擊斃了少數暴徒」（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徵文辦公室，1989：上冊）。

軍隊的命令，通常是通過軍用電臺下達。但是，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北京全民「截」兵，情況非常混亂，很多部隊不得不由乘車開進改為徒步開進，電臺通信車沒有跟隨。通訊兵背負的攜帶式電臺功率不大，在建築物林立的北京不起作用，有的通信兵與指揮官失散，許多部隊與上級失去聯絡。第 40 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在前進指揮部與開進途中的部隊，長時間失去聯絡；前進指揮部設立在建國門附近的一棟房子，由於四周高樓林立，軍用電臺不起作用，吳家民急得到處亂竄，最後只好派遣炮兵參謀安衛平，騎自行車外出聯絡。許多部隊不是通過軍用電臺收到開槍命令的，而是由上級機關派遣專人傳達的。

第 38 集團軍最早接到開槍命令，時間是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鐘前，也就是說，開槍命令差不多是在這時候下達的。第 38 軍也是最早奉命開槍的部隊，地點在萬壽路、五棵松一帶。目前已知的第一個死難者是，中國

航天部第二研究院 283 工廠的技術工人宋曉明，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十點鐘許，在五棵松十字路口西南方向的人行道上中槍死亡。

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研判，開槍命令由中央軍委下達，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楊尚昆不可能不知情；但他是謹小慎微之人，不會擅自做出開槍的決定，開槍命令一定是經過集體討論的，並得到鄧小平的許可。

陸、主要的屠殺地點

經過對各戒嚴部隊途經地點和北京各家醫院的資料搜索，確定從 1989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4 日清晨，北京發生軍民衝突的地點有一百多處，接受死難者遺體和傷員的醫院有八十多家。戒嚴部隊開槍屠殺主要發生在三個區域：第一個區域是木樨地至西單路口一帶；第二個區域是天橋、珠市口、前門一帶；第三個區域是南池子街南口。

木樨地、西單路口位於天安門廣場西面的西長安街，在這一帶開槍屠殺民眾的主要是第 38 集團軍，緊隨第 38 集團軍開進的第 63 集團軍步兵第 187 師，也有向民眾開槍。天橋、珠市口、前門位於天安門廣場的南面，在這一帶開槍屠殺民眾的主要是空降兵第 15 軍。途經天橋、珠市口、前門向天安門廣場開進的部隊，還有第 54 集團軍和第 26 集團軍步兵第 138 師。第 26 集團軍步兵第 138 師的先遣部隊在開進途中受阻後，與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匯合，也曾向民眾開槍。第 54 集團軍的多數部隊未接到開槍命令，沒有打開攜帶的子彈箱分發子彈。南池子街南口在東長安街，臨近天安門廣場東北部。第 38 集團軍部隊於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1 時 30 分抵達天安門城樓前，在天安門城樓東側設立了警戒線，時不時開槍射殺在南池子街南口抗議的民眾，至少包括三次大規模的開槍掃射。

民眾傷亡人數最多的，是在木樨地至西單路口一帶，附近的北京兒童醫院、復興醫院、北京鐵路醫院、北京郵電醫院、二龍路醫院，有很多死難者的遺體和傷員。民眾傷亡人數其次的，是在南池子街南口，死難者遺體和傷員大多被送到協和醫院、北京醫院。民眾傷亡人數第三多的，是在天橋、珠市口、前門一帶，死難者遺體和傷員大多被送到北京市急救中心、崇文門醫院、積水

潭醫院、同仁醫院。

柒、天安門廣場是否有人死亡

多年以來，戒嚴部隊是否在天安門廣場開槍鎮壓，天安門廣場是否有學生和民眾死亡，一直是引起爭議的焦點問題。原因是：（一）天安門廣場和天安門城樓歷來就是中國的地標，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又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加之學生的絕食請願，也讓天安門廣場成為八九民運的中心和世界關注的焦點，因此，當年西方媒體的報導通常將六四屠殺稱之為「天安門屠殺」。（二）中共當局在六四屠殺事件後遭到世界性的譴責，面臨強大的國際壓力，於是刻意將討論的焦點引到天安門廣場，強調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沒有開槍，沒有人在天安門廣場死亡；而屠殺確實不是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使得中共當局的說法具有相當的迷惑性，獲得不少認同。（三）曾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知名人士劉曉波、侯德健在被拘禁時接受中共官方媒體採訪，也說在天安門廣場沒有看到有人死亡；因為劉曉波、侯德健的特殊身份，導致更多的人相信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

其實，六四屠殺事件的核心問題，是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與發生在什麼地點並無關係；屠殺是發生在天安門廣場還是其他地方，沒有性質上的差別，本來不值得專門研究和辯駁，但因為這已成為爭議的焦點，有必要專門予以研究和辯駁。

其一、在天安門廣場清場的過程中，我與劉曉波、侯德健都在紀念碑基座的最高層，他倆說沒有看見有人死亡，這不是謊言，因為在同一地點的我也沒有看見有人死亡。但問題是，天安門廣場面積約 50 萬平方米，清場經歷了很長時間，光線又不足，任何個人的所見都是有限的，不能反映整個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情況。

其二、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親歷者都可以證明，在天安門廣場清場的過程中槍聲不斷，我親眼目睹兩名第 27 集團軍的偵察兵，在我身後數米遠的地方，開槍擊毀綁在紀念碑上的兩組高音喇叭。在現有的資料中，也有戒嚴部隊軍人提到曾在天安門廣場開槍。第 65 集團軍步兵第 193 師士兵郝連鎖，在署名

文章〈廣場東南角的槍聲〉中提到：「6月4日清晨5點20分左右，步兵第193師軍人曾在天安門廣場東南部開槍。」（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徵文辦公室，1989：下冊）。第65集團軍守備第3師第9團士兵陳曉利在回憶文章中說：「（1989年6月4日凌晨4時30分左右）我們看到，不知是那個部隊的奉命站在毛主席紀念堂北門臺階上對空鳴槍，子彈的彈道在天空上形成一道道紅色的亮光。」

其三、中共當局將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時間，說成是1989年6月4日凌晨4點30分至5點30分。1989年6月6日下午，戒嚴部隊發言人張工，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會說：「首先我想向新聞界的同志負責任地說明一個問題，並且也想通過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國人民明瞭，就是6月4日凌晨4時半至5時半，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群眾，也沒有軋死軋傷一個人。整個清場過程可以說是在強大的反覆的宣傳之下，基本上是一種和平的撤退。這個過程很清楚，沒有死一個人，沒有軋傷一個人。」

其實，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持續了4個小時，從6月4日凌晨1時25分空降兵第15軍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南面，凌晨1時30分第38集團軍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北面，清場行動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清晨6時左右。其間，北京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在「毛主席紀念堂」附近中槍死亡，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雙學士程仁興在國旗杆附近中槍死亡，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本科生李浩成在東南部中槍死亡；中槍受傷的有臺灣《中國時報》著名記者徐宗懋、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糾察隊負責人張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生程真在國旗杆附近，參與搶救一名中槍受傷的學生。香港《星島日報》記者蔡淑芳提供的一組照片顯示，天安門廣場臨時急救站中有不少中槍受傷的學生。中共當局所說的凌晨4時30分至5時30分的清場，只是最後針對堅守在紀念碑基座的數千名學生的清場。

捌、北京是否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中共當局聲稱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暴徒們殺害戒嚴部隊官兵，戒嚴部隊不得不採取武力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共當局有關北京發生反革命暴

亂的說法，顯然是為了給戒嚴部隊開槍鎮壓提供合理的藉口。六四後，中共官方電視臺不斷地播放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紀錄片，中共官方報刊不斷地發布戒嚴部隊軍人死亡的照片和文字報導，強化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謊言，以至於許多不明真相的中國民眾相信了中共當局的謊言。

1989年6月6日下午，袁木在中南海舉行的記者會上說：「解放軍官兵受傷5,000多人；地方上共傷2,000多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眾。」袁木故意將軍警和民眾的死亡數字混在一起。

1989年6月30日，陳希同在第7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8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說：「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6千多人，死亡數十人。」陳希同的軍警「死亡數十人」的說法很模糊，從21人到99人，都可以說是「數十人」。

在1989年6月19日至6月21日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李錫銘在《關於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情況的報告》中說：「經北京市與戒嚴部隊指揮部、公安部、中國紅十字會、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醫院等方面再三核實，有241人死亡。其中：戒嚴部隊指戰員23人，地方218人。戒嚴部隊23人中，解放軍10人，武警13人。」

李錫銘的報告提出了明確的軍警死亡數字，陳希同報告的時間晚於李錫銘的報告時間，反而沒有軍警的具體死亡人數，這也是令人奇怪的現象。袁木、陳希同、李錫銘關於軍警的死亡人數都不一樣，這正說明他們在說謊。

經過資料的搜集和研究，我確認戒嚴部隊軍警總共死亡15人，其中第38集團軍炮兵旅的士兵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因翻車死亡，第24集團軍步兵第70師步兵第210團排長王景生於1989年7月4日在巡邏途中病死，第39集團軍政治部宣傳處幹事於榮祿穿便裝拍照被戒嚴部隊誤殺；只有第63集團軍通信團排長劉國庚、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士兵崔國政、第54集團軍步兵第127師代理排長馬國選、第54集團軍步兵第162師步兵第486團後勤處參謀王錦偉、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第2支隊第1大隊通信班士兵李國瑞、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第1支隊第1大隊第1中隊士兵劉豔

坡、第 39 集團軍步兵第 115 師士兵臧立傑等 7 名軍人，死於被屠殺所激怒的民眾之手。我從中共官方公開的宣傳資料中，查清了這 15 名死亡軍人的死亡原因、死亡地點、死亡時間；關鍵是死亡時間，都是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一點鐘之後，而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始於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0 點鐘左右，因此可以得出結論：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在先，部分民眾以暴制暴在後；戒嚴部隊開槍殺人是因，部分民眾以暴制暴是果；時間先後，因果關係一目了然，說明當時的北京並不存在所謂的「反革命暴亂」。

參考文獻

- 《六四見證》編輯委員會編。1990。《六四見證——四十八名目擊證人的報告》。香港：Grassy Plan。
- 丁子霖。2005。《尋訪「六四」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社。
- 曾克編。1989。《血的見證——獻給英雄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中國教育報社。1989。《共和國衛士英烈集》。北京：中國卓越出版公司。
- 加利福尼亞大學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2010。《北京軍區部隊執行戒嚴任務中的政治工作》（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匯編）。加利福尼亞大學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
- 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編。1989。《首都公安幹警平暴紀實》。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3。《北京志（軍事卷 人民武裝警察志）》。北京：北京出版社。
- 光明日報出版社編輯部編。1989。《平暴英雄譜——平息反革命暴亂英模事蹟報告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朱超編。1989。《鐵軍挺進天安門》。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吳仁華。2007/2014。《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台北：真相出版社／台北：允晨出版社。
- 吳仁華。2009/2016。《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台北：真相出版社／台北：允晨出版社。
- 李鵬。2010。《李鵬六四日記》。洛杉磯：西點出版社。
- 杜導正。2010。《趙紫陽還說過什麼——杜導正日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宗鳳鳴。2007。《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
- 軒彥編。1989。《京都血火——學潮、動亂、暴亂平暴全過程紀實》。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
- 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司。1989。《驚心動魄的 56 天》。北京：大地出版社。
-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
- 張萬舒。2009。《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寒山碧編。1989。《歷史的創傷——1989 中國民運史料匯編》（上下冊）。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

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徵文辦公室。1989。《戒嚴一日》（上下冊）。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解放軍報編輯部編。1989。《捍衛社會主義共和國》。北京：長征出版社。

解放軍總政治部編。1990。《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匯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趙紫陽。2009。《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鄭念群。1989。《在戒嚴的日子裏》。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濟南軍區政治部編。1989。《共和國衛士的情懷》。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

瀋陽軍區政治部編。1989。《英雄譜 經驗錄》。瀋陽：白山出版社。

瀋陽軍區政治部編。1989。《特殊的考驗》。瀋陽：白山出版社。

蘇方學等。1989。《共和國衛士之歌——首都戒嚴部隊英模事蹟報告文學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鐘步編。1989。《新時期最可愛的人——北京戒嚴部隊英雄錄》。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A Study on the Truth of the June 4th Massacre

Wu Yenhua

Visiting Scholar,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Visiting Scholar, Chang Fo-chu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n internet search for 40 keywords associated with the June 4th Massacre. Detailed and painstaking comparison of the evidence establishes the steps by which the leadership applied martial law in Beijing, from the movement and deployment of troops to the facts of the killings, including the killing sites and the number of persons killed or wounded. This establishes beyond doubt that the order to shoot came from the highest echelons. The article proves the fals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laim that there wa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uprising.

Keywords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the June 4th Massacre, Martial Law in Beijing
